

司马光

江永红 ● 著

通鉴载道
司马光传



通鉴载道

司马光传

江永红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鉴载道：司马光传 / 江永红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5. 5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

ISBN 978-7-5063-8046-1

I. ①通… II. ①江… III. ①司马光(1019 ~ 1086) - 传记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3546号

通鉴载道——司马光传

作 者：江永红

责任编辑：江小燕

书籍设计：刘晓翔+韩湛宁

责任印制：李卫东 李大庆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字 数：380千

印 张：28.5

版 次：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046-1

定 价：43.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

组委会名单

主任：李 冰

委员：何建明 葛笑政

编委会名单

主任：何建明

委员：何西来 李炳银 张 陵 张水舟 黄宾堂

文史组专家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春瑜 王家新 王曾瑜 孙 郁 刘彦君 李 浩 何西来
郑欣淼 陶文鹏 党圣元 袁行霈 郭启宏 黄留珠 董乃斌

文学组专家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必胜 白 烨 田珍颖 刘 茵 张 陵 张水舟 李炳银
贺绍俊 黄宾堂 程步涛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化巨匠，他们如璀璨的群星，闪耀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系统和本正地记录他们的人生轨迹与文化成就，无疑是一件十分有必要的事。为此，中国作家协会于2012年初作出决定，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文学界和文化界的精兵强将，创作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这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文化出版工程，它对形象化地诠释和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公民的历史文化普及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这项原创的纪实体文学工程，预计出版120部左右。编委会与各方专家反复会商，遴选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120余位历史文化名人。在作者选择上，我们采取专家推荐、主动约请及社会选拔的方式，选择有文史功底、有创作实绩并有较大社会影响，能胜任繁重的实地采访、文献查阅及长篇创作任务，擅长传记文学创作的作家。创作的总体要求是，必须在尊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力求生动传神，追求本质的真实，塑造出饱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反对戏说、颠覆和凭空捏造，严禁抄袭；作家对传主要有客观的价值判断和对人物精神概括与提升的独到心得，要有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新传水平应当高于已有同一人物的传记作品。

为了保证丛书的高品质，我们聘请了学有专长、卓有成就的史学和文学专家，对书稿的文史真伪、价值取向、人物刻画和文学表现等方面总体把关，并建立了严格的论证机制，从传主的选择、作者的认定、写作大纲论证、书稿专项审定直至编辑、出版等，层层论证把关，力图使丛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从而达到传承中华文明和弘扬杰出文化人物精神之目的。丛书的封面设计，以中国历史长河为概念，取层层历史文化积淀与源远流长的宏大意象，采用各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与雅致温润的色条进行表达，意蕴深厚，庄重大气。内文的版式设计也尽可能做到精致、别具美感。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这百位文化名人就是杰出代表。他们的灿烂人生就是中华文明历史的缩影；他们的思想智慧、精神气脉深深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代代相袭的中华魂魄。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必定成为我们再出发的精神动力。

感谢关心、支持我们工作的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及专家们，更要感谢作者们呕心沥血的创作。由于该丛书工程浩大，人数众多，时间绵延较长，疏漏在所难免，期待各界有识之士提出宝贵的建设性意见，我们会努力做得更好。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

2013年11月



司马光

前言

我的司马光

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无数颗璀璨的文化巨星。儒学如孔、孟，楚辞如屈、宋，唐诗如李、杜，宋词如苏、辛……星列河汉，看得见，数不清。他们的巨星地位由自己的杰出贡献而奠定，此固然也，但给其作传，为其扬名者，史家也。史笔恰似运载火箭，把卫星发射升空。没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我们将永远无法读懂《离骚》；没有《三国志》，我们就只知道戏台上的曹操……

史学家在为他人定位时，也把自己安放在历史的经纬度内。史学界历来有“两司马”之说，即《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他们是中国史海之旗舰，史林之巨擘。司马迁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成正史编撰之圭臬，其后之《二十四史》无不遵之；司马光登编年体史书之顶峰（发端于《左传》），引发了编年体的写作热，后继者不乏其人，可惜只有望尘之憾。对“两司马”，许多人即使没有读过《史记》，至少也知道司马迁；而对后者，大多数人只知道“司马光砸缸”，至于他的《资治通鉴》，大抵没有走出学者的书斋，一些大官大款的书架上也摆着，附庸风雅而已。司马光先生，对不住了！现在是商品经济时代，互联网时代，快餐文化时代，没时间读您的大书了。况且，您的

书能帮我赚钱吗？听到这些，老先生一定会一脸茫然。你对他有多么茫然，他对你就有多么茫然。

不错。司马光时代已远去九个多世纪，一切都不可同日而语了。要认识他，需要有人介绍。写作本书，就是想为介绍司马光尽绵薄之力。在本书动笔前，我曾到山西夏县司马光墓园凭吊。与一些热门旅游景点人头攒动、嘈杂喧嚣的情形不同，这里安静得让人仿佛一下变成了聋子。园外的停车场上，只有送我来的一辆车，园中的访客只有我和陪同我的一个人。我问工作人员，一直这样吗？答曰：放长假时人不少。国家投资重修了司马光墓园，意在传承历史文化，发展人文旅游，却门前冷落车马稀，咋啦？转念一想，倘使一个人连司马光是谁都不知道，他会“到此一游”吗？他也许宁愿去寻访所谓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幽会处，津津有味地听导游带咸味的瞎掰，兴奋地发出哧哧的傻笑，然后一步三回头地离开。我顿时感到，介绍司马光的责任好沉好沉……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进入中国百位历史文化名人殿堂的入场券。这部长达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余万字的史学巨著，自北宋元丰七年（1084）修成，至今已印行七十余版，且形成了专门的通鉴学。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读之入迷，一生通读达十七遍之多，乃至书页残破，且在书中留下不少批语。他曾多次向干部推荐这部书，对书中的史实更是能随手拈来为自己的观点服务。在与历史学家吴晗谈话时，他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①

《资治通鉴》的主题思想（“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与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可毛泽东却说它写得好，理由是“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一语中的，内行。我们知道，纪传体史书的优长在于写人，但要弄清某一事件的本末，须将多人的纪、传以及表、志反复对照，且因纪、传中往往时间概念模糊，屡有相互矛盾之处，要捋清一件事谈

^① 刘志清：《司马光修史独乐园》，远方出版社，2004。

何容易，此其所短。而纪传体之短正是编年体史书之长，它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来龙去脉，一清二楚，但其短处是人物不如纪传体完整。从三家分晋至北宋开国前（前403—959）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纪传体的正史约有三千余万字，而《资治通鉴》用三百余万字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如此精炼，故事完整曲折，人物栩栩如生，难怪毛泽东要赞扬了。浓缩不易，在浓缩中增加信息量更是难能可贵。在《资治通鉴》中，南北朝部分新资料占十分之一，唐以后新资料占到一半，因此它绝非正史的改写版，而是再创作。据通鉴学者统计，除正史以外，司马光所参阅的野史、碑帖、家谱之类超过三百种以上，达三千余万字。而被他引用的书籍，今天大多已亡失。如此旁绍远求，细大不遗，却考证精当，前所未有。司马光是孔子的忠实信徒，而在修史上背弃了孔子“为尊者隐”的《春秋》笔法，对暴君、昏君秉笔直书，对明君如唐太宗的批评也直言不讳。总而言之，《资治通鉴》是一部文字最精炼、史料最丰富、考证最准确、叙事最生动的编年体通史。虽然以帝王为读者对象，但普通人也值得一读。为啥？它能让我们从历史经验中领悟上自国家兴替，下至为人处世的大智慧。大智慧是管小智慧的，没有大智慧的人终难摆脱浮躁与浅薄。

写司马光，自然要写他编撰《资治通鉴》的故事，但他不仅是史学家，还是政治家、思想家。如果不了解政治家、思想家司马光，就读不懂史学家司马光，甚至读不懂他的《资治通鉴》，特别是其中的史论——“臣光曰”。史书固然是写历史，但即使最严谨、最客观的史书，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治史者所处时代的或隐或显的印记。《资治通鉴》的绝大部分撰于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是变法与反变法生死较量的时期，而王安石和司马光分别是变法派和保守派这两个对立营垒的旗手。他俩从能在一起洗澡、能互相调侃的老朋友变成了无事不对立的老冤家，分别主导了王安石变法和清算变法的元祐更化这两大历史事件。司马光的后半生就是与王安石斗争的后半生，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主要活动就是与王安石做斗争。他俩死斗到死，斗到死后，功过是非，争论至今。

他俩都是北宋知识分子的精英。司马光考进士列甲科第六名，王安石礼部试第一（准状元），只因宋仁宗反感其试卷中有“孺子其朋”四字，降到第四名。他们都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少年得志，名声显赫，而生活简朴，私德高尚得近乎圣洁。仅举一例，他们的夫人都曾给他们买过妾，但都被果断拒绝，这在大官妻妾成群的宋代，恐怕神仙也难以做到。他们的性格一样的倔强，一个人称“司马牛”，一个被指“拗相公”。

按现在的说法，他们都是干部子弟，司马光是“官三代”，因父亲司马池官居四品（天章阁待制），可以靠“拼爹”恩荫当官，但恩荫的官因无功名（进士），被人鄙视，所以司马光与许多有志气的干部子弟一样，在恩荫得官后又参加了科举考试。王安石是“官二代”，父亲王益官衔只是从六品（都官员外郎），不够五品以上恩荫子弟的杠，他没法“拼爹”，要当官只能靠科举。在宋代，官员五品和六品虽只差一品，但六品是低级官员，着绿袍，五品是中级官员，着绯袍。这是关键的一级，升为五品标志着进入了特权阶层的行列。因此，司马光和王安石入仕前的生活环境包括家庭的社交圈是大不一样的。入仕后，他们的基层任职履历也差别较大。司马光只代理了几天县令，追随庞籍做过州通判，而王安石当知县政绩突出，不仅做过州通判，而且做过提点刑狱，对下情的了解更多。

司马光是北方人，任职基本在北方；王安石是南方人，入朝前任职一直在南方。宋朝士大夫中的南北矛盾由来已久。因赵氏皇帝起家于北方，加上有视中原政权为正统、而视南方割据政权为僭伪的传统观念，所以北宋官僚集团中北方人占优势，而且在南方人面前有一种征服者的优越感。科举考试中，南北方的录取标准区别很大。太宗时，开始是认分不认人，但中第者大多为南方人。北方河北、河东等五路（太宗时全国分十八路）几乎推了光头，举子因而敲登闻鼓请愿。太宗于是以北方拙于词令为由，令北五路单独再考，后来虽不另设考场，但把录取指标划拨到北五路。如此优待的结果是北五路的录取标准越来越低。熙宁三年（1070），也就是司马光的养子司马康以明经科登第的那年，神宗在

殿试中看到第四甲党铔的卷子文句不通，不禁大笑说，这样的人是怎么通过的？考官答曰：五路人按分数取末名通过。五路有专用指标，管你合格不合格，录够指标为止。神宗也不便取消指标，只好将其降到第五甲。这个对北方的优惠政策一直实行到北宋灭亡。南北方的赋税标准也不一样，宋初为稳固窃取来的政权，大幅度减免后周规定的赋税，三亩按一亩征收，而新征服的南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按原割据政权的标准收税，实际上是南北两制，南方推后甚至没有享受到减赋的恩惠。故北方的大地主多，南方的中小地主多。这些对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立场、观点不可能没有影响。

宋朝可以说是精英治国的朝代，知识分子的地位之高空前绝后。赵宋的皇冠强取于后周的孤儿寡母之手，为防止他人仿效，同时鉴于五代实行武人政治，致使兵连祸结的惨痛教训，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文臣知州事等举措，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公开宣布“与士大夫治天下”，而且规定了不杀读书人和言事者的祖训。宋朝大兴科举，不问门第贫富，考取即授官。从太宗赵光义开始，录取率是唐代的数十倍以至百倍以上。“宰相须用读书人”（太祖语），历任宰相都是进士甲科出身。这是一个破天荒的历史性进步。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优养，使历数千载的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涌现了灿若星河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唐宋八大家，六个在北宋，且与司马光同时代。与他同时代的还有被称为道学“北宋五子”的著名思想家周敦颐^①、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著名教育家胡瑗，著名科学家毕升、沈括，诗词名家更是难以数计，总之是人文荟萃，济济焉，浩瀚焉。从太宗赵光义开始，历任皇帝几乎都是书法家，有的还是诗人、音乐家、画家，文臣与皇帝唱和诗词，交流艺术，歌舞升平，其乐融融。

然而，重文抑武在带来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同时，却让宋朝患了软骨病。自赵光义收复幽州遭高粱河（今北京市内）之败后，宋便一蹶不振，再无国威军威可言。真宗赵恒畏敌如虎，在军事占主动的情况下

^① 本名惇颐，南宋为避光宗讳，被改为此名。

与辽国签订了“澶渊盟誓”，每年对辽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庆历二年九月，又增岁赐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合计五十万），不久后宋仁宗又承认了由节度使独立的西夏的国家地位，丢失大片土地，“岁赐”银、茶、绢二十五万五千（两、斤、匹）^①。开始，士大夫除少数佞臣外，普遍都有耻辱感，但随着真宗伪造天书、东封泰山、西祀后土、大兴宫观的闹剧开演后，士大夫从中得到了苟安的“红利”，许多人就反过来为花钱买平安制造理论根据了。时间一长，身在耻中不知耻，形成了一种苟安文化。士大夫在歌舞升平中挥麈清谈，尽情享受。但辽国哼一声，宋就发抖；西夏一挑衅，宋就慌神。可惜危机一过，又复苟安。

苟安文化的基础是苟安的物质利益。真宗写《劝学诗》，公开以“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来诱人读书。读书——当官——发财，是皇上指引的阳关大道。官员特别是高官的俸禄、赏赐优厚。宋代不禁止土地兼并，官员余钱主要投资田产，所以大地主几乎可以与大官画等号，即便本人不是大官，其父辈、祖辈必有大官。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日子太好了，要什么改革？要什么收复失地？到仁宗时，宋朝建国已近百年，沉痾在身，积重难返，最突出的问题是“三冗”：冗官、冗费、冗兵。“三冗”使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寅吃卯粮，国家穷，平民穷，而大官僚地主富得流油。面对危机，范仲淹曾主持“庆历新政”，改革首先从冗官开刀，仅此一举，就激起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抗。仁宗妥协了，新政如昙花一现，刚刚起步便无疾而终。司马光和王安石就是在这期间高中进士，走上政治舞台的。

脱离了这幅北宋风俗画，就读不懂士大夫阶层，也就读不懂司马光和王安石。

他俩都以天下为己任，面对宋廷这个“病人”，都坚信自己是最好的“医生”，坚信只有按自己开的“药方”才能挽救朝廷。但两人开出

① 《长编·卷一五二·庆历四年十月己丑》。具体数目为：岁赐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二万斤。进奉乾之节（宋仁宗生日）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贺正（元旦）贡献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仲冬（冬至）赐时服银五千两、绢五千匹及赐元昊生日礼物银器二千两、细衣著一千匹、杂帛二千匹。

的“药方”正好相反。

王安石要变法。南宋朱熹说：“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程颢）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王安石）所变更者，东坡（苏轼）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却去攻他。”^①当时改革是大势所趋，王安石是一颗最耀眼的政治、学术新星，不只是程颢、苏轼，包括后来成为保守派中坚的吕公著、韩维等人开始也是支持变法的，但改革就意味着利益的调整，就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拼死反抗，这一点王安石早有牺牲的思想准备，其他人却没有这个准备。而王安石的新法确实有些超前，如青苗法用金融借贷扶持贫穷农户，市易法用金融借贷扶持中小商户，这些都带有资本主义性质（黄仁宇语），把俗儒们惊得目瞪口呆，但他们很快就发现，王安石是要抑制大地主、大商人的兼并。于是乎，原来拥护变法的也倒向保守派，加入反变法的行列。他们联合宗室、后党向支持王安石的宋神宗施加压力，神宗让步了，变法派分裂了，王安石最后被外放金陵赋闲，但新法大多坚持下来。

按王安石的说法，“始终言新法不便者，司马光一人也”。不可否认，司马光是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但他不是那种靠兼并而富甲一方的豪强地主，而是一个学者。正因为此，他被保守派推到了旗手的地位。他固然是在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更是一个礼治的殉道者。他似乎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变法前，他对社会弊端的抨击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因为现实不符合他礼治理想；而变法开始后，他反对变法又比谁都积极，因为变法与他的礼治理想背道而驰。礼治的核心是等级制。与许多所谓纯儒一样，他企图在维持原有利益格局不变的前提下，靠皇帝和朝臣的道德示范和用君子、贬小人，达到等级有序、上下相安的太平盛世。他打着礼治的大旗，不经意间却为兼并辩护。所以王安石写《兼并》诗说：“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在王安石变法时，他拒绝了神宗任以执政大臣的“收买”，辞掉了枢密副使这个士大夫梦寐以求的职务，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本朝四》。

最后到洛阳完成了他的《资治通鉴》。神宗逝世，高太后垂帘。奉高太后之召，他一手高举着反变法的旗帜，一手紧握着礼治之剑，杀气腾腾地回朝执政。在高太后的支持下，一年多时间就闪电似的废掉了新法。可惜，他的礼治之剑已锈迹斑斑，本人已病入膏肓，废新法废成了一锅“夹生饭”。

“文革”中“评法批儒”，司马光被作为儒家，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硬是把他们纳入儒法斗争的轨道。其实，他们都是儒家，其分歧不在儒法，而在对儒家经典的不同界定和解读，在如何发展儒学才能使之适应社会需要。王安石崇孟（子），司马光《疑孟》崇扬（雄）；司马光注古本《孝经》，王安石处处质疑。王安石吸收诸子百家的合理成分，完成了“荆公新学”，成为北宋之宋学中最大的学派，而司马光则成为“道学六先生”之一。他们的学术论战不仅与变法反变法的实践相始终，而且先于其前，延于其后，乃至至今。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逝于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晚走四个多月。从表面上看，王安石死在失败的挽歌声中，司马光死在胜利的凯歌声中，其实他们都是在忧愁中带着遗憾走的。王安石之憾自不待言，司马光何忧？“元祐更化”前途未卜也。他们没有一个赢家，给我们留下两个殉道者的故事，留下一场没有演完的时代悲剧。他俩逝世后仅四十年，北宋灭亡了。

对中晚期的北宋来说，不敢说改革就一定能复兴，而不改革则注定要灭亡，对改革进行反攻倒算必然加速其灭亡。

本书不是第一本写司马光的书，力求写出一个真实的我的司马光，而避免重复他人的司马光。

我的司马光是北宋特殊政治、文化氛围中的司马光。比如，常有人说，宋代士大夫最有气节。不错，但可别忘了，那是因为有“不杀读书人和言事者”的政策兜底。司马光以气节名世，屡与皇帝当面斗气、顶牛，若非北宋，不可想象。他是北宋社会风俗画的一部分，只有在这幅画中他才是“真”的“活”的。

我的司马光是一个以帝师为己任的司马光。“国之治乱，尽在人

君”，是他政治观的核心，本着“责君严”和君臣相反相成、以成皇极的为臣之道，他几乎总是在“责君”。他官历四朝，仁宗、英宗、神宗，他都“责”了，唯有哲宗小皇帝和垂帘听政的高太后例外（恰恰是哲宗亲政后否了他的“元祐更化”）。即使在与王安石的搏杀中，也重在劝谏神宗。至于《资治通鉴》则事事着眼于教育皇帝。因此，他即使在著书立说时，也始终处于社会矛盾的冲突之中。

我的司马光是俯视下的司马光。好比一座雕像，仰视只能看到正面而看不到反面，只能看到表面而看不到里面。雕像是经过艺术处理的，有人仰视后自己也当开了化妆师和整容师，于是一个“高、大、全”的司马光出现在神坛上，而真实的司马光远去了。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对历史人物哪怕是明君贤臣也始终是俯视，而且手里拿着一把解剖刀。我写他，当然首先要向他学习。

因此，我的司马光，是一位伟大的顶尖历史学家，一位私德高尚、献身礼治理想的保守思想家，一位鞠躬尽瘁但不及格的政治家（更确切地说，是不及格的宰相）。这也许会让某些人感到不快，但观点可以争论，事实没法改变。司马光逝世后，有人对其高足刘安世说：“三代以下，宰相学术，司马文正一人而已。”刘安世回答说：“学术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图回四海者，未敢以为第一。盖元祐大臣类丰于德，而廉于才智也。先人亦云：‘司马公所谓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谏大夫执法殿中，劝讲经帷，用则前无古人矣。’”^①事实上，当宰相是司马光人生悲剧的高潮，不仅是因为“廉于才智”吧？

宋代营造了知识分子的“天堂”，而升入“天堂”的人们却亲手毁掉了这座“天堂”。不亦悲乎！

^①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第二十》。

目 录

001	前言 / 我的司马光
001	第一章 / 金榜题名时
012	第二章 / 洞房花烛夜
021	第三章 / 初任幕职官
029	第四章 / 代父草谏章
038	第五章 / 慈孝父子情
047	第六章 / 练政在滑州
058	第七章 / 法官与校勘
070	第八章 / 卫礼在礼院
081	第九章 / 出朝随恩师
093	第十章 / 谁解升官愁
103	第十一章 / 结识王安石
113	第十二章 / 分道未扬镳
123	第十三章 / 建储立奇功
133	第十四章 / 忧在萧墙内
144	第十五章 / 谏官的悲哀
154	第十六章 / “濮议”战宰执
164	第十七章 / 奉旨开书局
174	第十八章 / 没读懂神宗
184	第十九章 / 面授御制序
195	第二十章 / 朝堂两杆旗